

常熟文史

第 21 輯

記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

虞東教育學院陳桐

追憶常熟書畫家潘建

國英 初期常熟市的鹽務管理工作

虞松壽 附 年

東莞縣志的取廢修訂與應用

劉品輝 附錄 附 附錄

CHANGSHU WENSHI

常熟文史



CHANGSHU WENSHI

常熟文史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编辑说明

一、《常熟文史资料辑存》创刊于1961年，迄今30多年来，已刊印20辑，约300万字。《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的征集、出版，为保存乡土历史资料，进行乡土知识教育，增进海内外同乡乡谊，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文史资料工作今后仍然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会将遵循政协全国会议关于文史工作的精神，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作出新的贡献。

三、30多年来，我会着重征集、出版了建国前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史料；今后，我会除继续征集建国前有关史料外，并将把重点转移到建国后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史料的征集上来。实现这一“转轨”，是由于：1.建国后各条战线都出现了深刻的巨大的变化，必须抓紧时机把它记录下来，存史记实；2.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使之更好地为当前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

四、广开思路，增辟史料渠道，在坚持出版综合型文史资料的同时，分期征集、出版专题型文史资料。成熟一本就刊印一本。

五、征集“亲历、亲见、亲闻”史料是我会文史工作的传统特色。要求历届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以及一切爱国人士，积极撰写稿件，协力同心，办好本刊。本刊刊名，自21辑起更名为《常熟文史》。对各类稿件，仍坚持“四不”方针：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论形式，不求完整。本刊在内部发行。编辑者对来稿有

删节、修改或留作参考之权。限于水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对本刊所载史料提出补充、订正或质疑，对编辑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目 录

记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陈月盘 蔡瑞荣搜集整理	(1)
杰出的核科学家、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李 毅	(5)
王淦昌先生弃家办学·····许汉民	(11)
王淦昌先生年表·····	(13)
美术教育家温肇桐·····庞翔勋	(20)
朗月清风常在人间·····吴正明	(30)
怀念温肇桐教授·····沈 虹	(36)
庞士龙先生艺术事略·····归之春	(40)
我的艺术生涯·····钟月樵	(44)
评弹花絮·····沈秋农	(61)
导演艺术家胡伟民·····徐耀良	(67)
锡剧艺术家钟嘉禄及其门徒顾嘉生·····孙善康	(72)
抗战前常熟书画家略述·····李 猷	(77)
常熟市中苏友协始末·····王菊生	(93)
解放初期常熟市的群众文化工作·····陈 通	(95)
家父毛柏生和瞿氏兄弟·····毛行洁	(106)
常熟方言中留存的唐诗语词(续)·····金 戈	(111)
关于《大充集》·····郑耀民	(113)
虞山诗派中的重要一家	
——《大充集》作者钱龙惕简介·····乐 雯	(116)
附录：钱龙惕《大充集》诗选·····	(118)
人月圆·····归 舍	(122)

海虞谜史钩沉·····	韦梁臣(123)
之园纪实·····	翁之澈(128)
虞城奇石追踪·····	张振宁(138)
石狮处处·····	倩 子(144)
石梅小学史料琐集·····	王化民(146)
忆常熟县青年读书会·····	周西平(153)
报业旧事二则·····	汪青萍(155)
常熟律师业概述·····	言群明(159)
常熟乡村电话的起始与发展·····	钱次龙(162)
记常熟县无线电实验室·····	吴肇基(165)
解放初期在银行工作回忆之一——货币管理·····	蔡树德(167)
常熟旧典当拾零·····	李炎锸(170)
常熟最早的素菜馆·····	宋以天(176)
鸿运楼的兴衰·····	吉 人(178)
“八一四”空战中的一则小故事·····	郑耀民(180)
常熟沦陷时期杂事二则·····	毛德新(182)
军统局京沪联络站常熟点见闻·····	李鹤年口述 黄忠整理(184)
常熟汪伪特工站·····	李建国(190)
常熟的“中统”和“军统”·····	曹家俊(192)
乡心不尽九州同	
——读者对《常熟掌故》的意见和建议摘录·····	编 者(198)
关于征集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启事·····	本 会(205)

记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

陈月盘 蔡瑞荣搜集整理

王淦昌先生是当代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他不仅在粒子物理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发现和贡献，而且也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的核武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以广博精深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爱祖国、爱人民、申张正义、乐于助人、坦荡、谦逊、平易近人的崇高品格教育熏陶了几代人。他确实不愧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王淦昌先生为我市支塘镇枫塘湾人。父亲王以仁是位颇有名望的中医，清宣统三年(1911年)去世。王淦昌幼年是在私塾中度过的，熟读《百家姓》、《孟子》、《论语》等书。1915年，转入太仓县沙溪小学读书。1920年其母又因病去世。王淦昌怙恃俱失，在外婆和大哥的资助下，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该校数学教师周培(号翰澜)对他的影响最大。在周老师的指导下，王淦昌在中学里就读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在浦东，他最感兴趣的学科是数学，其次是英语。1925年，王淦昌被录取为清华首届本科生，一年后分科进了物理系。

清华物理系是由我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教授创建的。叶是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的鼓励 and 个别传授，更加激发了王淦昌对了解实验物理学的信心和决心。1928年，王在读大学四年级时，叶企孙于当年聘请吴有训到清华物理系主持近代物理课程。吴也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大师。在教学中，吴有训也很快对王淦昌这个学生有了良好的印象。叶、吴两位大师是王淦昌的物理学启蒙老师，也是他踏上物理学研究征途的引路人。

为了培养中国的优秀物理学家，叶企孙鼓励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出国深造。王淦昌去了德国，还有两位学生一去法国（施士元），一去美国（周同庆）。

王淦昌出国留学是考取的官费留学研究生，他却以官费让给候补生，自己以自费留学，让祖国多培养一个人才。王淦昌在德国留学四年，当时正是现代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迅猛发展。

1933年12月19日，王淦昌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且顺利地通过了答辩。1934年，王淦昌从德国回国。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一·二八”两次侵华战争以后，他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宁愿与养育了他的土地和同胞共患难。可是，旧中国没有从事近代物理研究的条件。他先是在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他认为报效国家的最好选择，是培养人才，使近代物理在中国生根开花。以后，他又到浙江大学担任教授及系主任，他所培养的杰出的学生李政道、李寿楠、李天庆、李文涛，合称“浙大四李”。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侵华战争，他与浙大师生一起开始了迁移、流亡生活。在这期间，不管多么艰难困苦，只要一定下来，就支起黑板为学生讲课。以科学报效祖国，始终是王淦昌的奋斗目标，所以，即使是在流亡的岁月里，条件相当艰苦，甚至在不时听到枪炮声和爆炸声的危险时刻，也没有停止过科学研究。浙大湄潭（在贵州省）理学院的学术气氛依然十分浓厚。

1944年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分会召开第十二届年会时，英国学者李约瑟夫妇专程到会作了报告，我国科学家竺可桢、王淦昌、胡刚复、姚鑫等教授也在会上发表了论文。这次会议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万万没有想到正在抗击日寇侵略的中国内地还有这么一片科学的绿洲。于是，他亲切地将浙大的湄潭理学院誉之为“东方的剑桥”。正是在这个艰苦时期，王淦昌在菜油灯下

先后写下并发表了十余篇科学论文。他在艰苦的15年中为祖国培养了一代物理英才，也为日后的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和核弹研制打下了基础。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王淦昌的科研事业获得了新生。1950年4月，他应钱三强的邀请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员。翌年被任命为该所副所长，领导并参加了宇宙线的研究。从1955年起，王淦昌等有关宇宙线的一批科研成果陆续在《物理学报》和《科学记录》上发表，到1957年落雪山宇宙线观测站已搜集到700多个奇异粒子的事例，其中有些是稀有的。

1956年9月，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建立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莫斯科)，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到该所任研究员，后又兼任副所长，从事基本粒子的研究。在四年多的研究过程中，王淦昌领导的物理小组取得了国际性的辉煌成果。

1960年12月24日，在杜布纳联合研究所任期届满。回国不久，他就接受了研制原子弹的新任务。他和从美国回来的郭永怀等人一起，分别负责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当时，陈毅、彭德怀等领导同志曾到实验室去看望他们。陈毅握着王淦昌的手说：“有你们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也好当了。”1963年，随着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王淦昌又来到海拔三千多米的青海高原和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戈壁深处，继续进行聚合爆轰实验，做好原子弹爆炸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望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过了不到三年，我国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原子弹、氢弹爆炸的成功，震动了全世界，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了。1969年9月23日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王淦昌对于我国成为第五个核大国是有重要贡献和功劳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79年10月，72岁高龄的王淦昌实现了自己的宏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近十多年来，王淦昌关注的是我国核能的和平利用，发展核

电事业，以缓解我国近期能源短缺的困难。

1978年10月，他曾与四位核专家一起联名上书中央，提出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的建议。美国三哩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发生后，王淦昌大声疾呼三哩岛事件可以避免，核电是较安全清洁的能源。王淦昌等有识之士针对当前我国能源短缺的现状，主张发展核电事业，在他们的大力呼吁、推动下，我国的三个核电站——秦山、大亚湾、金山核电站先后投入施工。

为了一劳永逸解决能源问题，人们将目光投向热核聚变的研究和应用，热核聚变的主要原料是氘，海水中就有氘，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关键是发生热核聚变需要有高达几千万度的温度。任何已知的物质在这么高的温度下都要被气化，驾驭它非常困难。因此，如何控制核聚变反应就成了当代科学技术界一个重大攻关课题。早在1964年12月，他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就独立提出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设想，为实现可控核反应指明了研究方向。

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钊、王祝翔荣获反西格马负超子研究自然科学(1956—1980)一等奖，这是我国物理学家迄今获得的最高自然科学奖。1984年4月18日，在联邦德国驻华使馆，西柏林大学授予王淦昌荣誉证书，以作为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的纪念。德国人趣称王淦昌为“金博士”。他是享受这一荣誉的唯一的中国人。该校校长黑克尔曼将证书庄重地交给王淦昌时，在致词中称他为研究基本粒子的卓越科学家。1989年莫斯科大学授予王淦昌名誉博士学位。

王淦昌不仅是核科学的开拓者和激光热核聚变的奠基人，而且是和平利用核能的倡导者。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如李政道、胡济民、唐孝威等杰出的科学家。王淦昌今年86岁高龄，他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仍为祖国的强盛而努力操劳着。在我们值得自豪的历代人才辈出的常熟，又有这位名播欧亚、誉满全球、最负盛名的老科学家，为常熟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

杰出的核科学家 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李 毅

1979年10月20日，是杰出的核科学家王淦昌同志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日子。

当时，王淦昌同志已经是七十二岁高龄了，他是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科协副主席、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许多重要职务，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始终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经常深入基层，亲自指导由他倡议开创的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工作。

核化工专家、二机部副部长姜圣阶同志和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能够介绍象王淦昌这样的同志入党，感到十分荣幸。

1955年，我奉命从解放军调到原子能科研战线，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已改名为物理研究所）当一名科研后勤兵。从此和王淦昌同志在一起工作，他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三十多年里虽然由于工作需要，我们有时分开，但都是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核科学、核工业而共同奋战，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革命友谊是与日俱增的。

淦昌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开始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现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他为核科学在中国生根，为培养一代又一

代核科学研究人才，为我国核科学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呕心沥血；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关，发扬国威，做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功勋。

淦昌同志年逾古稀，贡献卓著，荣誉很高，为什么在十年浩劫之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呢？这绝不是偶然的。正如他申请入党时说的：“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一个十亿人民、八亿农民的大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曲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更加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端正航向，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我之所以十分高兴地介绍淦昌同志入党，不仅仅因为他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和贡献，对国防现代化建设建立了重大功勋，更因为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具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共产党的赤诚之心；特别是在历史关键时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表现出政治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态度明朗，无私无畏，正气凛然，经受过严峻的考验。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都是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当具备的品质。

淦昌同志三十年代留学德国，27岁获博士学位后，怀着报效祖国的一片赤诚，回到满目疮痍、民族危亡的祖国，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同情青年学生的爱国活动，曾掩护过进步青年，使他们免遭反动当局的毒手。

新中国成立后，淦昌同志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协助所长吴有训、钱三强，与彭桓武等同志一起，为聚集人才，创造科研条件，培养干部，创建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而艰苦奋斗。

1951年5月，王淦昌、朱洪元等科学家，响应党的号召，前往西南大区参加土地改革。亲身体会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不是命中注定，而是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从而认识到党领导农民翻身分田、反封建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探测美军是否在战场上投掷放射性物质，王淦昌和所里一些同志遵照上级指示，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然后与吴桓兴、林传骥同志跨过鸭绿江，深入一片焦土的朝鲜战场，冒着生命危险，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了四个多月，胜利完成了国家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

1952年起，在王淦昌和肖健同志领导下，设计建造了磁云室。1954年在云南省落雪山海拔3180米处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先后安装了多板云室和磁云室，开始了奇异粒子和高能核作用的研究工作，培养了成批的青年科学人才。

1955年起，我们在一起工作。由于所长钱三强同志忙于国家原子能事业的筹备工作，所里日常的学术工作经常是由王淦昌同志主持，我直接配合和保证他的工作。时间虽不太长，但我们之间很快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发现他具有许多长处：他生活艰苦朴素，胸襟坦荡诚恳，敢于说真心话，敢于开展批评，也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他富有民主精神，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发挥众人的才干；他热情宽厚，平等待人，从不妒贤嫉能，从不凭个人好恶嫌弃人才；他在研究工作上惯于亲临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对年轻人耐心培养；他对党政干部、后勤人员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以权威科学家自居，不盛气凌人，不鄙视别人的劳动。他确实树立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与党政干部、后勤人员同志式团结合作的典范。

1956年9月，淦昌同志和我作为国家的全权代表到莫斯科参加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成立会议。会后，遵照上级决定，他留在联合所工作，先任高级研究员，后担任副所长，直到1960年底回国。他在联合所工作期间，刻苦钻研业务，热心培养中国的和苏联、东

欧国家的年轻科研人员，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四年多的时间里，他身在联合所，时刻关心着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国内同志到联合所参加各种会议时，他都非常热情地询问各种情况，并邀请他们向在联合所工作、实习的中国同志们介绍国内情况，以鼓舞大家不畏艰险、勇攀科学高峰的斗志。在他领导的研究组（组内有中国的年轻科学工作者丁大钊、王祝翔同志，还有苏联、东欧和朝鲜、越南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在10 Gev的高能加速器上，作出了国际水平的科学成果——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

1960年底，淦昌同志在联合所任期届满返回国内，正遇上国家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淦昌同志在国外一贯生活俭朴，这时他把从工资中节省下来的14万卢布（旧币，合14,000新卢布），全部捐献给国家，以分担国家的暂时困难。

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后，我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决心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业，尽快掌握原子弹、氢弹技术，以打破国际核垄断和核讹诈。1961年4月，二机部刘杰部长约王淦昌同志谈话，拟请他去核武器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并到青海高原从事“两弹”攻关任务。淦昌同志慨然应允，响亮回答：“以身许国！”这是多么感人的豪言壮语啊！

淦昌同志在海拔三千多米以上的青海高原，昼夜奋战，与其他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接连攻破了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关，为国家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立下了重大功勋。但在十年浩劫期间，那里却成了重灾区，连王淦昌这样忠心耿耿的著名科学家也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淦昌同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用无言的沉默表示坚决的抵制和蔑视。每次批判大会后，他都是一回到住地，就继续投入科学研究和解决技术关键的工作中去。

严峻的考验一个接着一个。“四人帮”刮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王淦昌同志从来没有举过手表示同意。在北京开会期间，

有一天要中断会议，叫到会全体人员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王淦昌同志无私无畏，当场表示不赞成这样的做法。

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举国哀痛。但“四人帮”不允许悼念总理。清明节前，淦昌同志带头和五位同志把准备好的花圈，亲自送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表示对总理的沉痛哀悼，对“四人帮”的强烈抗议。“天安门事件”后，有人找王淦昌同志追查：“是谁让你送花圈的？”淦昌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我自己要送的，因为我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在那是非颠倒、邪恶横行的日子里，这样正气凛然的回答，要冒何等的风险啊！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王淦昌同志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不久，我也重获解放，恢复了“文革”前在原子能所的职务。我们两人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战了二十余年，并且经历了十年浩劫，不仅都活了过来，而且又在一起工作了。

他虽已年逾古稀，但仍然和二十多年前一样，不知疲倦，不分昼夜地辛勤操劳，为发展原子能科学事业，继续呕心沥血。他亲自出马邀请戴传曾、梅镇岳、黄祖洽、王乃彦等科学家回所（或来所）工作。他除了抓全所的科研方向和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抓重大设备的更新改造、人才培养工作之外，还倡议开辟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和氟化氪激光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是在他直接领导和亲自参加下开展起来的。他经常深入实验室，始终不脱离科研工作第一线，为全所科技人员树立了榜样。

1979年10月入党以后，淦昌同志显得更年轻，干劲更足了，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更加虚心了……。1980年中国新闻社记者来所采访，曾看到王老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依我看，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对此深有感觉。……要来个‘拼命工作’，把科研搞上去！”这表达了他搞科研工作争分夺秒，一分钟也不能耽误的急切心情。

为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精神，使

我所科研生产等各项工作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淦昌同志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启发大家座谈讨论，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他在1981年1月15日召开的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我所科研方针、方向的建议，供大家讨论。他的建议是：

“重应用，固基础；
利民生，挖潜力；
发扬民主，集思广益；
加强团结，为国出力。”

他的思路和建议，启发和教育了全所科技人员，为以后具体贯彻“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和核工业“保军转民”方针，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1981年10月30日，淦昌同志在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我对原子能事业有深厚的感情，对原子能所有深厚的感情，总希望把她搞得更好一些。……”他还说：“今天把我选进新的党委会，我年龄最大，党龄最短，内心有愧。我决心作为党委的一份子贡献自己的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把‘两弹’过关时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起来，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淦昌同志的讲话，语重心长，感人至深。他高尚的道德情操，他的模范表率作用，他的谆谆教导，激励着我们不畏艰险，奋勇前进！

在庆祝他八十寿辰的日子里，恭祝他健康长寿，老当益壮，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立新的功勋！

（本文系李毅同志为庆祝王淦昌同志八十寿辰时所作，发表于科学出版社《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一书）